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张岱年 主编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          |       |
|----------|-------|
| 尊隐       | 大同书   |
| 默觚       | 仁学    |
| 采西学议     | 建国方略  |
| 使西纪程     | 砭旧危言  |
| 张园文录外编   |       |
| 筹洋刍议     | 恤书    |
| 盛世危言     | 新民说   |
| 论世变之亟    | 猛回头   |
| 新政真诠     | 睡的人醒了 |
| 强学—戊戌时论选 |       |
| 民声—辛亥时论选 |       |
| 新潮—民初时论选 |       |

# 砭旧危言

唐才常宋恕集

郑大华 任 菁 选注

·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

# 砭旧危言

唐才常 宋恕集

---

郑大华 任菁 选注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沈阳

# (辽)新登字1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砭旧危言：唐才常、宋恕集/郑大华等选注.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6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张岱年主编)

ISBN 7-205-02870-1

I. 砭…

II. 郑…

III. ①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②政论-中国-近代-选集

③唐才常-文集④宋恕-文集

IV. D092.5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92,000 印张：10  $\frac{1}{8}$  插页：5

印数：1—1,590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

责任编辑：华玉洪

责任校对：安丽君

封面设计：赵多良

版式设计：赵耀今

---

定价：10.60元

##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总序

在历史即将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这套“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件极有意义、极值得称道的事。

尽管这些著述原是撰写于 80 多年以前，它的作者也和那个时代一起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当人们重新翻阅这些古色斑斑的书页时，仍然无法轻松和平静。这是启蒙先驱者们的呐喊和沉思，它激昂、悲壮而又深沉无比，仿佛融进了多少代人的希冀与渴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启蒙者和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写下了最为辉煌又最为感人的一章。

它发生在中国大封建王朝彻底崩溃的前夜。这是一个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时代，亦是中国近代社会一个大转变的时代。那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已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后面，国内矛盾重重，国外列强环伺。自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始，帝国主义的坚舰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中国就被推向了备受屈辱和更加不幸的境地。但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舰利炮并没有把中国人吓倒，相反却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危

亡感，从而开始了一场持久而又悲壮的救亡运动。民族救亡、爱国强国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成了整个启蒙运动的主旋律。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近代社会大转变的时期也是“门户开放”、“西学东渐”的时期。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当时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一方面撷择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利于变革的观点，如《周易》的变易观念、《公羊传》的“三世”观念、《礼运》的大同思想等；一方面参照当时所了解的西方情况提出一些革新的方案。当时梁启超、章太炎通过日本译籍而了解西学，严复则直接介绍了西方近代的一些进步学说。严译的《天演论》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在当时风行一时。孙中山则直接接受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而根据国情加以改造，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和伟大并不在于它是否取得了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和胜利，而是在于它曾给人们心灵上所带来的强烈而持久的震撼；并不在于它自身理论的如何完美，而是在于它曾给予，并继续给予人们的启示和思索。许多启蒙思想家们苦苦追问和求索的问题诸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制、教育与科技、东方与西方、爱国与强国、农业经济与工业生产、儒家伦理与现代文明等等，即使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启蒙者的思想连同那一次又一次的启蒙运动一起不仅属于历史，它同时更应该属于或必然属于今天和未来。虽然“洋务运动”过去了，“变法维

新”过去了，“辛亥革命”过去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完结，五四运动便是启蒙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一再提倡解放思想，更换脑筋，这又何尝不是启蒙精神在新时代的高扬？

今年是五四运动 75 周年，我们谨以这套丛书来纪念“五四”，也呼唤着新的启蒙精神的到来。

**张岱年**

1994 年 1 月于北京大学

## 编 序

唐才常，字轶丞，亦字佛尘，自号泚澚子。是中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初期的著名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1867年出生于湖南浏阳县，与当时另一位著名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谭嗣同是同乡好友，人称“浏阳二杰”。

唐才常自幼好读书，但“不为章句所束缚，究心实学，尤娴于中西史乘”。<sup>①</sup> 1887年入长沙岳麓书院，后肄业，兼在校经书院附课，课卷多名列前茅。1891年冬，应四川学政瞿鸿禨之聘，任四川学署阅卷总校并兼课其子女。1893年秋返回浏阳，受聘欧阳中鹄家塾教读。欧阳中鹄为湘著名学者，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思想比较开明，唐才常和谭嗣同均事以师礼，受其影响颇深。

1894年春，唐才常考入武昌两湖书院，后肄业，所应诸课累居第一，是该院的高材生。在其课艺中，他针砭时弊，要求变革。《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说》一文，批评士大夫们受科举取士制度的毒害，“不强其于学一己，以求实际”，而是“相习为虚骄，处则好大言，出则辱君命”，

---

①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2页。

除“其草木笺疏而外，远不识五方之风气，近未谙一国之兴衰”，乃至在内忧外患，“奇险环生”之际，国家“欲求一通变之人才而不可得。”是故他反对空文误国，指出：“学术不分门课实，人才无收效之期；人才非淬厉得来，学术亦荒唐之具。”在给二弟的书信中，唐才常一再强调：“时艺在所必废，舆地、格致之学，在所必兴。”在《历代商政与欧洲各国同异考》一文，就中西商政进行了全面比较，指出：中国“自秦以来，商政废弛，日甚一日，甚或沦为异族，百计挫抑”，除“重租税以困辱之”外，商人还不得仕官为吏，甚且“不得衣丝乘车”。与中国的抑商政策相反，“西人雅重商民，多方护持。无论君主民主之国，商民胥得自达于其主。有大役，必使议政院及商民杂议，然后施行，务使上下之情，无所壅蔽”。由于中国抑商，西方护商，其结果，中国是“官商隔绝，缓急不可恃。诎吏中饱，朝野两穷”；而“泰西诸国，上下一心，竭精殚虑，强甲五洲”。故此，唐才常要求学习西法，变通商政，实行富民强国政策。此外，唐才常还主张效法西方，兴革钱币，改革兵制，广设武备学堂，以雪国耻。

就在唐才常考入两湖书院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节节失利，战争最后以清政府派遣李鸿章使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宣告结束。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唐才常感到“可耻万分”，他怒斥李鸿章出洋议定和约“非是和倭，直是降倭，奸臣卖国，古今所无”。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他还对洋务派和顽固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洋



务派“徒粉饰夤缘以邀厚糈，于制造学术茫无头绪”；而顽固派“惟痛诋西学，目为异类，以自护其时文试帖之短”；特别是湖南的士人“虚骄尤甚，辄为大言曰：‘夷人特深畏我湖南耳！’及问其所以制敌之策，则曰：‘恃我忠义之气在。’且力斥殚心铁政制造者‘用夷变夏’，势欲得而甘心焉”。在唐才常看来，要挽救中国危亡于万一，只有维新变法之一法，即以中国周、孔之道植其根柢，学习西方综核名实，以求通变化裁之用，如此才能抗雄欧美各国；否之，“如再拘泥故常，因循不振，虚以圣人之道，自欺欺人，异日求为土耳其，暹罗之苟延残喘而不得，乃任彼教之横行中土而无可与抗，则匪惟中原陆沉之忧，而吾千万年周、孔之道，将有不堪设想之日。天地奇变，古今异局，难保其必不至于此也”。不久，唐才常又撰《孟子言三宝为当今治国要务说》一文，全面阐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他写道：土地、人民、政事是孟子所说的“三宝”，也是“浑括《周官》之精意之言”，治理好这三者，国家就可以富强，“但自秦汉迄今，孔孟真源，销亡歇寂，三者几任其自为消长而莫为之所”，这也是导致中国目前“穷且尽”，受人宰割的根源。因此，为今之计，在土地方面：应向西人那样，以垦荒、治河、开矿为大纲，设农务、河务、矿务各大臣总其成，择其可用机器者用之，以省人力而开地产；在人民方面：“总当如泰西讲求教养诸政”，从而使“吾民庶免为印度之续，英、俄之俦”；在政事方面：“练兵通商，宜以英、德为法，而汰绿营，废漕运，创银行、行国债，修铁

路，设民厂，立邮政，广商轮、及凡织造枪械，百端并举，”“又必斟酌中西而设律科，力昭信义而列公法，毋徒夜郎自大，孤立五洲之间。要之，必先废时文帖括之业，广立天文、算学、武备、舆地、格致诸科，以奔走天下士，民智乃能骤开，人才乃能崛起，国权乃能抵距，而不蹈北洋前此有名无实之弊”。为此，唐才常极力倡导广立学会，派遣游学，设立赛工艺会和中西条例馆，并拟定了游历例言，设赛工艺会条例和开中西条例馆条例。他并身体力行，致力于湖南和浏阳的改革，在浏阳建立格致书院，开办算学馆，招商股开办浏阳煤矿，运动在浏阳成立矿务分局。

1897年，唐才常与毕永年、樊锥等同举光绪丁酉科拔贡。此时，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也正蓬勃发展。唐才常和谭嗣同一道，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在湖南积极地投入了这一运动。4月，以宣传维新变法为宗旨的《湘学新报》旬刊（半年后改名《湘学报》）在长沙创刊，唐才常任总编辑兼史学、时务、交涉三栏编辑和撰稿人。《湘学报》不仅是湖南第一份报刊，而且在全国影响也很大。8月，为培养维新人才，唐才常和谭嗣同等人又创办起湖南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来湖南任中文总教习，唐本人也任中文教习工作。次年初，他们又在长沙发起成立南学会，以团结全省维新力量，推进湖南的维新运动。3月，南学会机关报《湘报》问世，唐才常任董事长之一兼主编，在创刊号序文中，揭示《湘报》的宗旨是：“使中国为极聪

强极文明之国，”“义求平实，力戒游谈，以辅《时务》、《知新》、《湘学》诸报所不逮”。

在积极从事维新变法运动的同时，唐才常还先后在《湘学报》、《湘报》上发表了三十余篇鼓吹维新变法，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民权学说的文章，企图“以文字改良社会”，启蒙民众。

为了论证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唐才常大量介绍各国兴亡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以事实说明变法国则强，不变法国必亡的道理。土耳其、埃及、印度、波斯及中国都是世界文明古国，但最终都因墨守成规、拒绝变法而弱亡。日本虽是一岛国，无论国土、人口，还是物产，都远远不能与中国相比，然而由于能“师于素不相识之国”，虚心向西方国家学习，“变则竟变，百折不回，迥异吾所云取西政之枝叶一二端济其权力之私者”，“故变法只三十年，而修慧修福，遂积成阿僧祇无量之功力，为亚东雄国”。唐才常还大力提倡明治维新时期“二三侠士仁人，出死力，排众议”，“积愤回天”的精神，激发人们“矢大愿，合大群”，以“万死一生，肝脑涂地”的勇气和“热力”从事变法活动。他自己也表示：“吾能使吾君公权于国，公国于天，赫然如俄之彼得，日本之陆仁，尽变祖宗之成法，与天下更始，则吾虽犯天下之不韪，负天下之恶名，粉骨齑身，所忻慕焉。”

唐才常对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封建专制以一人而尊天下，“私之至也！”

他大声疾呼：“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肩輿天下者，天下盜之矣；愚罔天下者，天下暴之矣”。他推崇西方的民主政治，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与中国封建专制的“私天下”相反，是“公天下”，“私天下者不长，公天下者罔不昌也”。在唐才常看来，民主的“公天下”，主要体现在国令制度，“大抵泰西各国之命脉，悬于国令；国令之机要，系于民心。拂其欲则上下沸腾，愜其情则君氏交泰”。他赞扬西方的国令制度是“太平之公理，仁学之真詮”。并相信，“将来二十周文致太平之地球，其以此哉！”故此，他要求变中国的封建专制的“私天下”为民主的“公天下”，实行“重民、公国、平等、平权之大义”。唐才常还对顽固派反对民权民主学说、反对变专制为民主予以了揭露和批判。他在《辨惑》（上）中写道：“今夫泰西政术、自会盟、征伐、爵赏、刑律，下逮间巷纤悉之事，无不与国人谋之，而大旨趋重于全民生，去民害，保民权。中国则辗转秦汉二千余年之桎梏，近日始有倡为民政民权之说者，而二三庸夫，骤闻斯旨，惧然惊愕；其略睹西史者，则援法、奥之事，动色相戒；其次则并不知民权为何物，只疑其弗便于官权，而诤之曰：此西法也，覈言也，吾步趋之何为也？”实际上，唐才常指出，民权对于中国人来说并非完全陌生的东西，“其实任举《孟子》、《公羊》及六经中一言一例，无弗重民、贵民、公权于民者”，只是自秦汉以后专制制度立民权民主学说反而淹没不彰了。

唐才常认为：欲行新政，必得新人；欲得新人，就必

须扫除封建文化，废除八股时文，因为八股时文是导致中国“塞智摧权腐心亡我之国以有今日”的祸根。他撰有《时文流毒中国论》一文，在历数了八股时文的种种流毒后指出：“时文不废，孔教万无可存之理；孔教既亡，黄种万无可存之理。”他大力提倡新型教育，要求广立天文、算学、武备、格致、舆地诸科，认为如此“民智乃能骤开，人才乃能崛起，国权乃能抵拒，……此救时之良法”。为此，他倡办浏阳算学馆，改革南台书院课程，开设史学、掌故、舆地诸门，使浏阳士子兴起求实学以济时用的风气。1898年3月，又与人共同创办群萌学会，广储书报，讲学论政，影响很大。

唐才常虽然身在湖南，但他时刻关心着全国维新变法运动的进展。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宣布变法，唐才常大受鼓舞，认为中国如此下去大有希望。8月初，他应挚友军机章京谭嗣同的电邀，赴京襄助新政，行抵武汉，突闻西太后发动政变，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挚友的遇难，新政的流产，使唐才常悲声痛哭，他决心继承烈士的遗志，完成挚友未竟的伟业。在《戊戌八月感事诗》中他写道：“殷忧耿耿在神州，时事如斯孰与谋。南海行踪空想象，中原大局半沉浮。满朝旧党仇新党，几辈清流付浊流。千古非常奇变起，拔万誓斩佞臣头。”这里充分表达了他对“旧党”的切齿痛恨，和誓用鲜血和生命推进变法的决心。

戊戌变法失败后，唐才常并没有被“黑云压城城欲

摧”的险恶形势所吓倒，仍在坚持斗争。1899年3月起他主编《亚东时报》，以天游居士，咄咄和尚，蔚蓝等笔名发表诗文，抨击顽固派，继续宣传维新变法。他的诗文曰“大率以开拓民智、阐明公理，改革旧习，以激发其忠君爱国之志气为宗旨”，<sup>①</sup>揭露政变后“至愚极悍”的满清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他在《砭旧危言》一文中警告清政府说：“自诛戮党人，无罪可坐，而士心解体；自皇上幽禁，谤言四起，而民心解体；自刚毅南下，搜刮无遗，而官商解体。夫至天下人心，均已离散，虽日颁懿旨，自言其深仁厚泽，超越前朝……谁则信之？而谁则服之？”唐才常的言论，在那万马齐喑的年代，犹如投枪和匕首，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

1900年春，唐才常和林圭在上海成立了自立会，并设领导机关于汉口，积极筹划武装起义。是年夏，北方爆发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为借口攻占津京，慈禧挟光绪帝仓皇出逃西安，北方陷入混乱状态。唐才常利用这一时机，加紧活动。7月，他在上海张园召开了有上海维新人士和各界名流数百人参加的“中国国会”，国会的宗旨宣称：“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要“创造新自立国”；但同时又力主“清光绪皇帝复辟”。国会宗旨的这种自相矛盾反映了唐才常当时游移于革命与改良之间的思想状态。会议结束后，唐才常即赶赴武

---

<sup>①</sup> 《义士唐才常传》，《清议报全编》，卷15。

汉亲自筹划和领导自立军起义。然而就在准备工作紧罗密鼓进行的时候，清湖广总督张之洞在英国驻汉口领事的支持和帮助下，于8月22日凌晨派兵包围了设在汉口英租界内的自立军总部，唐才常、林圭等三十余人被捕。唐在法庭上，“慷慨指斥西太后罪状，言事既不成，有死而已，遂不复言”。<sup>①</sup>当天深夜，唐才常等二十余人英勇就义于武昌紫阳湖畔。就义前他作《临难诗》一首，其诗曰：“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邱，”<sup>②</sup>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唐才常牺牲时年仅34岁。

宋恕比唐才常年长几岁，1862年他出生于浙江温州平阳一个业儒世家，原名存礼、字燕生，后改名恕，字平子，号六斋，晚年更名衡，是中国近代一位值得重视的启蒙思想家。

宋恕自幼聪慧异常，读书能过目成诵，8岁入塾，9岁即能为古今体文，故有神童之誉。年14，见《王阳明遗书》，深喜其“歹心不安，虽言出孔子，未敢以为是”之说。16岁为县诸生。宋恕的才学深得侍读学士孙锵鸣的喜爱，被孙招为女婿。从此，他师事孙衣言、锵鸣兄弟，并从衣言子经学大师孙诒让问学，学识大进。他与东清陈虬、瑞安陈介石，均为莫逆之交，经常一起切磋讨论，吟诗作文，时人称为“温州三杰”。

---

① 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见《唐才常集》第279页。

② 《唐才常集》第265页。

1887年，宋恕随岳父到上海、南京，以后又到杭州。繁华的上海租界，太平天国失败后荒凉的江南城乡，尤其是中国在中法战争中的不败而败，给他思想以极大震动，他立志“欲扫西庭壮本朝”，于是他遍交海内名士，博览各种典籍和近译欧美著作，寻找救国救民的途径。1890年，在俞樾的介绍下，他前往武汉求见清湖广总督张之洞，申说变法主张，未被接纳。

1891年他移住温州瑞安，开始着手撰写《六字课斋卑议》，并于次年4月誊清。在《六字课斋卑议》中，宋恕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维新变法主张。《卑议》完稿后，宋恕即携稿北上天津，求见直隶总督、大学士李鸿章，除将《六字课斋卑议》呈给李外，还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上李中堂书》。他在书中指出：“法穷而不变，虽使伊尹当国，傅说佐之，不能致治，今日之事是也，”因此中国要挽救危万，只有变法之一途，而要变法，必须从“三始”，即：“欲化文、武、满、汉之域，必自更官制始；欲通君、臣、官、民之气，必自设议院始；欲兴兵、农、礼、乐之学，必自改试令始。”而“欲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因为不易服改制，耳目就不会新：“耳目不新，则精神不振，主持不彰，则趋慕不一。”他并举古今历史以证明易服改制的重要性：“昔者赵武灵王患国之不武，令易胡服以习骑射，而赵兵之强遂冠三晋，卒能北却匈奴，西抗暴秦；魏孝文帝患国之不文，令易华服以习礼容，而魏儒之盛遂追两汉，卒能柔屈南朝，治安中土；近者东方之君患国之因循，令



易西服以习新学，而千年积重一旦顿移，卒能扬声于西，称雄于东；此皆易服之明效大验也。”故此，宋恕认为：“易服更制，一切从西，策之上也；参用西法，徐俟默移，策之中也；不肯变通，但责今实，策之下也。”而他的书稿上策欲言而未敢，下策谐俗而羞言；“兹所言者，皆不上不下，居策之中，视今日之政，则已为甚高，较西国之法，则犹未免卑，故命曰‘卑议’。”宋恕求见李鸿章的目的，是希望李能采纳他的变法主张，“建大议，挽大局，除周后之弊，反秦前之治，塞东邻之笑，御西土之侮”，但上书的结果是没有下文，他本人也没有得到重用，仅被派充水师学堂汉文教习。

宋恕上书不达，转而开始博览诸子百家，写作《六字课斋津谈》，1895年2月杀青。这是一部上下古今中外、出入经史子集，抨击封建旧文化，揭露秦汉礼法和程朱理学的反动本质，进而论证维新变法之必要性和合理性的理论著作。全书共十六类三百九十五章。“它的写成，标志了宋恕从古文经学出发的托古改制思想体系的确立。”<sup>①</sup>

《六字课斋津谈》完稿不久，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为挽救危亡，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维新变法运动日益高涨。对于维新变法运动，宋恕是积极支持

---

① 《宋恕集》上册，“编者的话”，第2页。